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

王桂新
(复旦大学 人口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主要通过深入的考察、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农村人口的非户籍乡—城迁移始终为迁移主流、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口迁移的城乡—区域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文章最后还进一步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这些特征所显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口迁移; 迁移机制; 城乡模式; 区域模式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4149 (2004) 04- 0001- 09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pulation Migration Since 1978

WANG Gui_xi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deep analy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opulation migr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It points outs that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come to be more active since 1978, rural to urban migration withou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hange come to be the main theme, migration reason and mechanism have changed a lot, and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pattern has showed something new. The paper ends with explain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changes.

Key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 migration mechanism; rural-urban pattern; region pattern

自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已历时20余年。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社会结构明显弱化,产业变动、城市化进程以及国民经济增长空前加速。与此同时,深受这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人口迁移,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考察人口迁移及其特征,不仅可以把握人口迁移本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可能影响,而且也可以由此透视经济增长的特征、趋势及其对人口迁移可能的反作用。本文拟主要考察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发展动向及特征。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发展主要表现出如下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

收稿日期: 2003- 11- 11 修订日期: 2004- 02- 12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模式研究(01JA840010)》资助。

作者简介: 王桂新(1953-),男,山东诸城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移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十分活跃和平稳发展的,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而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的。概而观之,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平稳发展期 (1978~ 1983 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第一阶段自 1978 年到 1983 年。在这一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刚起步不久,尚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期探索阶段,改革开放的推进以稳妥为主。因此,在这一阶段的人口迁移,除受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影响,主要有如“三线”移民返迁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等带有一定补偿、回归性质的人口迁移表现比较活跃以外,在整体上仍主要承接过去的发展趋势,基本没有大起大落,发展相对比较平稳。

中国自 1978 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是首先从农村地区开始的。农村地区的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大量的农村隐性过剩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形成了规模巨大、几乎可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的潜在“资源”。根据农业部门的调查,1985 年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30%~50%,绝对规模在 1 亿人以上,如果再加上被抚养人口,则总数可达 2 亿人^[1]。

如此大规模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何在?当时城市就业制度的改革尚未触及,横断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二元社会结构也仍被视为不可侵犯之“物”,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大门仍然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继续受到严格的控制。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村经济发展能量的积聚和释放,终于在原有社队企业的基础上爆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央政府也频频发文,大力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并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苏南地区率先创造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流模式;乡镇企业也相应成为当时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因此,在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及经济的发展,并未带动人口迁移同步增长,中国的人口迁移,在整体上仍主要延续改革开放以前的基本趋势呈平稳发展态势,人口迁移量大致保持在 1400~2300 万人之间^[2]。省际年间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基本都分别在 100 万人和 1‰以下^①。

(2) 渐趋增强期 (1984~ 1994 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越来越多地解放出来,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蓄水池”的乡镇企业已难以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囿于农村的“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模式正欲待突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已有效地加快了集镇及小城镇的建设。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的控制开始有所缓和。特别是 1984 年 10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镇落户问题的通知》,放宽了农民迁移进镇的标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进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户籍制度及农民就业政策的首次重大改革。

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也已由农村发展到城市,城市的“保障就业或安置就业”制度开始受到冲击,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建立,快速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已创造并提供了农村劳动力迁入、就业的竞争机会和“空间”容量,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就业成为可能。政府部门也相继出台了一些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镇就业为目的的政策,并加强了对城镇外来劳动力的管理。于是,步步深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流动注入了巨大的启动力,激发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及城乡分割制约所形成、集聚起来的迁移流动“势能”得以释放,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由原来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囿于农村的

① 本节有关省际年间迁移人数及迁移率除特别说明者以外,均为作者根据 1987 年、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1990 年、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调整处理得到。

“就地转移”、“就地流动”模式，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走出农村的“异地转移”、“异地流动”模式转变，并由主要向小城镇迁移流动逐步发展到向各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迁移流动，表现在迁移流动规模及强度上即呈渐趋扩大、增强态势。由于此间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规定，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流动实行了一定的控制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流动的过快增长，因而使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流动基本保持稳定发展、渐趋增强的趋势，如省际年间迁移人数由120万增加到320万，迁移率由1‰左右上升到2.5‰以上。

(3) 高度活跃期 (1995~ 2000 年)

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以后，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此所带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发及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以及外企、外资的大举进入，都有力地刺激了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劳动就业机会。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住房、粮食及日常生活用品供给的市场化，逐步解除了没有户籍的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后顾之忧。特别在进入1990年代后期，已建立40余年的十分稳固的户籍制度继1984年进行首次较大改革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如国务院1997年6月批转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并在有关省市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试点；上海、广州、厦门等一些大城市也自行出台了类似“蓝印户口”、“居住证”制度等一些新政策，初步打开了农村人口入迁居住的大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力度较大的省区更是根据自身实际，开始对户籍制度进行大胆的改革。如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户籍制度改革，近年来在拆除户籍藩篱、打破城乡壁垒方面屡有“大手笔”，据有关部门2001年底统计，此前三年多来，浙江省城镇净迁入人口达190余万人，其中仅2001年以来即达到66万多人^①。甚至一些省区已开始考虑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改革。十数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效果的积累，终使进入1990年代后期，在地区、城乡之间显著的经济收入差异及就业机会的推、拉作用下，中西部地带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及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迁移流动规模急剧膨胀，使人口迁移进入高度活跃期。1995年，省际迁移人数及迁移率分别为350多万和3‰左右，到2000年短短数年即分别迅速增加到1000多万和8‰以上，均增加2倍左右。

二、农村人口的非户籍乡—城迁移始终为迁移主流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今仍以农村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为主体，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农村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仍分别占总人口的63.08%和75.27%，这就决定了中国迁移人口也同样以农村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为主体。正如以上所说，率先开展的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把大量的农村隐性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形成了规模巨大、几乎可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在的迁移“资源”。在城市改革开放、人口迁移控制政策逐步缓和、城乡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潜在的迁移“资源”即参与迁移活动，转变为现实的迁移流动人口。如表1所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迁移人口中，农村迁出人口一般都占迁出总人口的60%左右及以上，显示了农村迁出人口为中国迁移人口的主体特征。当然，根据该表也可看出，农村迁出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1982~1987年间，其比例为68%左右，此后渐趋下降，到1995~2000年间，已大约下降到59%，十余年时间下跌了近10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村人口的比例趋向下降，作为农村迁出人口的“潜在”资源不断减少。而且随着城市改革开放的深化，城市人口的迁移活动也日渐活跃起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迁出人口相对比例的下降。

^① 沈锡权 顾大伟：拆除户籍藩篱 浙江领跑户籍制度改革，《新华网》2001年12月29日。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镇迁移人口的演变

期间	迁出入	农村（县）		市、镇		农村迁向市镇人口	
		万人	%	万人	%	万人	%
1982~ 1987	迁出	2076.02	67.99	977.24	32.00	1545.19	74.43
	迁入	721.50	23.63	2331.69	76.37		
1985~ 1990	迁出	2130.11	62.48	1279.00	37.52	1671.82	78.48
	迁入	590.47	17.30	2822.29	82.70		
1990~ 1995	迁出	1985.55	59.75	1337.43	40.25	1194.71	60.17
	迁入	948.96	28.56	2374.02	71.44		
1995~ 2000	迁出	7316.24	58.70	5148.17	41.30	5065.50	68.96
	迁入	1710.94	11.85	12728.14	88.15		

资料来源：根据 1987 年、1990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1990 年、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由表 1 还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约占中国迁移人口 60% 以上的农村迁出人口，又主要选择迁入了城市。除 1990~ 1995 年间以外，农村迁出人口选择迁向城市的比例几乎都高达 70% 以上。中国迁移人口的主体——农村迁出人口，又绝大部分选择迁向城市，由此所形成的乡—城迁移，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加之日趋活跃的城市人口迁移，使中国迁移人口选择迁向城市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到 1995~ 2000 年间，中国迁移人口选择迁向城市的比例已直逼 90%（88.15%）。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口迁移是城市化的重要途径和形式之一，日趋活跃的人口迁移，必定推动和加快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由于直到 20 世纪末，中国的户籍制度本身并未进行根本性改革，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个很强的封闭系统。城市社会保障“资源”的稀缺性，城市居民的“本地”权益及下岗、失业劳动力的再就业保护等问题，都构成了农村迁入人口获得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非农业户籍居民的巨大障碍。所以虽然人口迁移已极为活跃，农村人口和农业户籍人口是人口迁移流动的主体，但他们还基本都是未伴随户籍的迁移，他们迁入城市就业、生活，而户籍仍在农村，为典型的城乡人户分离人口，他们与城市本地居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农村迁出人口或农业户籍人口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体，也就意味着未伴随户籍的迁移流动，即“非”户籍人口迁移流动为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主流^①。这一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从人口调查的人、户（籍）分离情况得以说明。如根据人口普查，1982 年“居住本县、市（区）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和“居住本县、市（区）不足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即人与户分离的“两款”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 0.66%，到 1990 年该“两款人”的比例即上升到 1.91%；2000 年人口普查将统计口径调整为“居住本县、市（区）半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和“居住本县、市（区）不足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但该人、户分离的“两款”人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仍明显超越统计口径调整的影响，进一步骤然上升到 11.62%。这些均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进展，尽管农村迁出人口比例有下降倾向，但人、户分离的迁移、流动或未伴随户籍的迁移流动却反呈急剧增强趋势；1990 年代后期人口迁移流动的高度活跃，主要是未伴随户籍的人口迁移流动，即“非”户籍人口迁移流动的高度活跃。另外，从以下“务工经商”理由对人口迁移特别是对省际人口迁移影响的显著增大也说明了这一点。

①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户籍制度的“衍生”权益逐渐减少，城市人口对户籍的概念已有所淡化，在发生迁移行为时未必很在乎户籍问题，不伴随户籍的迁移行为也时有发生，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人口未伴随户籍迁移流动的主流特征。

很明显，在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和以农村人口及农业户籍人口为主体的条件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流动，形成了以农村迁出人口为主体、城镇迁出人口为辅和以未伴随户籍的“非”户籍人口迁移流动为主流、户籍人口迁移流动为辅的迁移流动的“二元”特征；农村迁出人口集中选择迁向城市的“非”户籍乡—城迁移，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及其“非完全”迁移特征，也构成了中国“非完全”城市化这一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迁移原因及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明显受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户籍制度及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等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口迁移流动原因及机制仍然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为影响原因逐步由以社会原因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原因为主、发生机制逐步由以计划组织为主转变为市场调节占主导地位。

1. 迁移原因的变化

首先从人口迁移的单项原因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迁移流动影响最大的“首位原因”在1980年代初期为“工作调动”，受该原因影响而迁移的移民比例约为20%，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则转变为“务工经商”，受其影响而迁移的移民比例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后期分别上升为25%和30%以上。特别对省际人口迁移来说，受“务工经商”这一“首位原因”影响而迁移的移民比例竟分别急剧上升到30%和65%左右（表2、表3）。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改革开放的进展，不仅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首位原因”发生了变化，而且“首位原因”对人口迁移、特别是省际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亦明显增强。

表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因别迁移人口比例的变化										%
期间	工作调动	分配录用	务工经商	学习培训	投亲靠友	拆迁搬家	退休退职	随迁家属	婚姻迁入	其他
1982~ 1987	20.57	5.10	8.24	8.72	13.27	—	2.60	19.78	15.76	5.96
1985~ 1990	11.87	6.03	25.12	12.14	9.84	—	1.56	10.44	13.94	9.06
1995~ 2000	4.28	3.11	30.73	11.66	5.02	14.52	—	12.85	12.02	5.03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因别省际迁移人口比例的变化										%
期间	工作调动	分配录用	务工经商	学习培训	投亲靠友	拆迁搬家	退休退职	随迁家属	婚姻迁入	其他
1982~ 1987	19.89	5.26	8.57	9.02	13.35	—	2.54	18.68	15.54	6.15
1985~ 1990	15.06	4.53	29.46	8.38	10.39	—	1.48	10.86	13.66	6.18
1995~ 2000	2.67	1.55	64.75	6.30	5.02	0.79	—	9.25	5.48	4.18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原因类型别省际迁移人口比例的变化						%
期间	经济型			社会型	其他	
	小计	计划型	市场型			
1982~ 1987	33.72	25.15	8.57	59.13	6.15	
1985~ 1990	49.05	19.59	29.46	44.77	6.18	
1995~ 2000	68.97	4.22	64.75	26.84	4.18	

资料来源：根据表 3。

由于“工作调动”迁移基本属城镇人口的“专利”和伴随户籍的迁移，“务工经商”迁移则主要为农村人口及未伴随户籍的迁移，这些未伴随户籍迁移流动到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又被称为外来人口或农民工，所以“务工经商”迁移人口的显著增多，不仅进一步说明了上述农村人口及其未伴随户籍的迁移流动为迁移主体和主流的事实，而且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民工潮”的蓬勃兴起。

如果把迁移原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和“务工经商”归类为经济原因,把“学习培训”、“投亲靠友”、“拆迁搬家”、“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和“婚姻迁入”归类为社会原因,则在1980年代前期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明显以社会原因为主,如受社会原因影响而引发的省际迁移人数几乎占迁移总数的60%,而经济原因的影响显然小得多,引发的省际迁移人数只大约占迁移总数的34%。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原因的影响逐渐减弱,经济原因的影响明显增强,到1985~1990年间,社会原因引发的省际迁移人口比例约下降到45%,经济原因形成的省际迁移人口比例相反上升为50%:特别进入1990年代后期,社会原因引发的省际迁移人口比例已下降到约27%,而受经济原因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已进一步增强,影响的迁移人口比例已几乎接近70%,为社会原因引发迁移人数的2.5倍以上(表4)。这也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人口的迁移已越来越演变为以受经济原因影响为主导的经济型迁移,因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2. 迁移机制的变化

人口迁移流动原因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人口迁移流动机制的变化。如表4所示,如果根据经济原因影响人口迁移的计划性和市场化特征,进一步把“工作调动”和“分配录用”作为计划组织型迁移,把“务工经商”作为市场调节型迁移,则可以明显看出,在经济原因形成的人口迁移中,归属计划组织型省际迁移人口的比例在1980年代初期约为25%,1980年代后期大致下降到20%,到1995~2000年间进一步下降为4%左右。与此相反,归属市场调节型的省际迁移人口在1980年代前期仅占8%左右,1980年代后期即大致上升为30%,到1995~2000年间则进一步迅速增长到约65%。这显示人口迁移流动机制的变化与改革开放的进展基本是一致的,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及改革力度的增大,人口迁移流动机制也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组织为主转变为市场调节占明显主导地位。

四、人口迁移流动的城乡一区域模式出现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条件下,中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总体格局,决定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主要向城市迁移、中西部地区人口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的基本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由于改革开放的进展及改革力度的增大,人口迁移原因及机制逐步转变为以经济原因和市场机制为主,人口迁移的流向选择越来越趋向理性,特别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及差异变化的新动向,使人口迁移流动的城乡一区域模式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 人口迁移城乡模式的变化

人口迁移城乡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迁出、迁入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城市迁出、迁入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迁移人口越来越选择向城市迁移集中。前已述及,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农村人口的比例趋向下降,作为农村迁出人口的“潜在”资源不断减少,城市改革开放的深化,也使城市人口的迁移活动日渐活跃起来,从而造成农村迁移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城市迁移比例的上升。如表1所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1987年间,农村迁出、迁入人口分别占67.99%和23.63%,到1995~2000年间,两比例已分别下降为58.70%和11.85%:与此相反,城市迁出、迁入人口的比例则由1982~1987年间的32.00%和76.37%上升为1995~2000年间的41.30%和88.15%。农村迁出、迁入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城市迁出、迁入人口的比例明显上升,说明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密切相关,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特别是199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高度活跃,主要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的城市化乡→城迁移的高度活跃,选择迁向城市的移民比例已直逼90%。尽管这种活跃的乡→城迁移及其所形成的城市化形式具有“不完全”性特征,但在一定意义上,这样的人口迁移流动,也仍将加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2. 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区域模式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化迁移流动趋势越来越强。如表 5 所示，在 1980 年代，东、中、西三地区迁出人口比例还大致相当，各占三成左右，但到 1990 年代则出现明显变化，东部沿海地区迁出人口比例显著减小，中部地带迁出比例迅速增大，西部地带迁出比例基本稳定。与此相反，从迁入人口比例来看，三地区从 1980 年代以来即存在很大差异，开始大约五成多集中选择迁入东部沿海地区，近五成均分迁入中、西部地区。后选择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迅速持续增加，到 1990 年代后期其所占比例已上升到 76%；而选择迁入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比例则呈下降趋势，尤以中部地区最甚，1990 年代后期二者所占比例已分别下降为 9% 和 15% 左右。东、中、西三地区迁出、迁入人口比例的反向变化，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迁移人口的流向表现出显著的“向海性”特征；这一特征，使迁移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另外，还有一个不太明显但却很有意义的变化，就是与 1980 年代比较，1990 年代以来中、西部地区迁移人口的分布发生了逆转：迁出人口比例中部地区超过西部地区，迁入人口比例西部地区超过中部地区。如西部地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0 年代后期的人口迁入率已高居全国第四位。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 1990 年代以来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初见成效，西部地区已呈人口入迁的相对集中化趋势，迁移流动人口正在用自己的“足”投支持西部大开发的票。

表 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东、中、西三地区差异

迁移变量	期间	1982~ 1987	1985~ 1990	1990~ 1995	1995~ 2000
迁出人口比例 (%)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东部地区	31.76	33.08	26.29	18.51
	中部地区	34.83	31.39	38.74	46.95
	西部地区	33.41	35.54	34.97	34.54
迁入人口比例 (%)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东部地区	52.02	54.58	65.05	76.41
	中部地区	24.65	23.99	14.71	9.06
	西部地区	23.33	21.42	20.25	14.53

资料来源：同表 1。

表 6 泛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省际人口迁入趋势的变化

区域	迁入人数 (万人)				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人口的比例 (%)			
	1982~ 1987	1985~ 1990	1990~ 1995	1995~ 2000	1982~ 1987	1985~ 1990	1990~ 1995	1995~ 2000
两三角洲合计	126.57	305.00	410.11	1829.19	20.22	27.56	38.49	56.67
长三角 (小计)	96.85	179.25	215.48	679.09	15.47	16.2	20.22	21.04
上海	37.19	66.55	72.05	216.78	5.94	6.01	6.76	6.72
江苏	47.45	79.11	96.83	190.84	7.58	7.15	9.09	5.91
浙江	12.21	33.59	46.60	271.47	1.95	3.04	4.37	8.41
珠三角 (广东)	29.72	125.75	194.63	1150.10	4.75	11.36	18.27	35.63

资料来源：同表 1。

第二，人口入迁集中化趋势珠三角后来居上、势压长三角。如表 6 所示，向东部地区越来越集中化的入迁人口，又主要表现为向泛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和泛珠江三角洲

(广东)越来越强势的集中^①。到1990年代后期,选择入迁该两三角洲的迁移流动人口已达一千八百多万,占全国迁移人口的比例由1980年代前期的20%左右猛增到56%以上。从两三角洲来看,选择入迁长三角的迁移流动人口在1980年代前期尚为珠三角的3倍以上,后差距不断减小,到1990年代前期二者已基本接近,但进入1990年代后期,选择入迁珠三角的迁移流动人口猛增,一跃反超长三角,几乎达入迁长三角迁移流动人口的1.7倍。对泛长江三角洲来讲,在1990年代后期,只有浙江省的入迁人口迅速增长、“一枝独秀”,而江、沪两地则或衰减或稳定不前。在人口迁移流动机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情况下,迁移流动人口对迁移流向的选择,是其用“足”对区域发展活力及经济增长趋势投票结果的反映。因此,以上迁移流动人口的集中化趋势说明,至少在1990年代后期,珠三角的发展势头明显超越长三角;而在长三角,浙江省的发展势头又明显超越江、沪两地。

五、几点启示

以上,本文采精摘要,考察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迁移发展的几个特征。这些特征显示: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影响中国人口迁移的体制、政策等宏观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以上所列举的人口迁移的几个特征,无不与这一宏观环境的变化密切联系在一起。进入新世纪,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全国各地正在对1950年代末期出台的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展开大张旗鼓的改革,以户籍制度为基础构建的二元社会结构也随之不断弱化,作为中国人口迁移主体的农村人口正在获得自由迁移的更大权利。因此可以推断,在21世纪,中国的人口迁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密切相关,人口迁移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城市化,加快经济发展需要城市化,实现现代化更需要城市化。而人口迁移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人口迁移是推进城市化的必经之“路”,没有人口迁移就不可能有城市化。所以中国要解决“三农”问题、加快经济发展、尽早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以积极态度鼓励和推动人口迁移的发展;人口迁移的发展也必将对解决“三农”问题、加快经济发展、尽早实现现代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作为迁移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口以及他们的乡—城迁移,还基本属于“非”户籍迁移,他们的绝大部分迁移到城市以后还被称为外来人口或农民工,他们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由于人、户分离,他们在城市贡献自己的青春之后还要迁返农村,使自己人、户合一。农村人口这种身份的“终身性”,显然与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的原则格格不入;他们人、户分离的“非完全”迁移以及所形成的“非完全”城市化,也不符合现代社会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的人口迁移,还有待于由目前人、户分离的“非”户籍迁移向人、户合一的户籍迁移转变,由目前的“非完全”迁移和“非完全”城市化向“完全”迁移和“完全”城市化转变。要完成这样的转变,尚需进一步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改革开放还任重道远。

第四,在市场主导作用下,人口迁移的流向分布反映迁移人口用“足”对区域发展活力及经济增长趋势投票的结果。理性和智慧总是促使人们选择迁向那些经济增长快、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充满发展活力的地区。改革开放20余年来,人口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化迁移趋势不断增强,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仍处明显优势地位。虽然199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初见成效,但东西差异的基本格局仍会长期存在,而且在今后数十年甚至数十年内还将可能呈进一步扩大趋势。

(下转第14页)

^① 这里所指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均为泛三角洲的概念,即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省。而且为称谓方便,有时将二者简称为长三角和珠三角。

人^[8]。70 年代以前的每对夫妇平均约有 5~ 6 个孩子，父母抚养所有子女成人、成家，孩子都长大后，自己也步入了老年，没有什么积蓄养老，只能依靠子女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目前一对夫妇只生 1~ 2 个孩子，城市基本上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使家庭子代数减少，家庭代际层次简单化，随之家庭代际关系也简单化，相对应对父母代的养老资源也减少。过去一家几个孩子共同赡养一对老人，而今是 1~ 2 个孩子赡养寿命逐渐延长的两对甚至更多的老人。

从人口学角度来讲，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老年人需求增多，意味着家庭养老资源的不足。但是父母需要抚养的孩子数量减少，年龄较轻时就摆脱了孩子的累赘，可把全心放在工作挣钱上，经济收入又大幅度提高，父母将子女抚养成人后仍有余力为自己老年生活进行积蓄。表面看，计划生育使多子女共同承担的养老任务集中在 1~ 2 个孩子身上，子女负担加重，实质上父母将少生的孩子的抚养费用作为积累留给了自己，使自身积累明显增加，养老能力增强，与此同时，也减轻了子女赡养父母的负担。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依靠子女养老是难以保证的。在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服务严重短缺，中青年高效率、快节奏的工作和社会生活，使家庭代际矛盾日益显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多代同堂家庭的代际矛盾更为突出。亲代年龄较大，退休又早，经济收入不多，难以承担长辈的养老经济资源供给，那么祖代和亲代的养老责任将落在中年子代或青年孙代肩上。基于此状，完全由家庭养老越来越不现实，就是居壮思老，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般三代家庭代际关系中，老少关系比较密切，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子女成家后，特别在子女生育以后，年轻夫妇多数同一方父母同居生活，需要父母代抚育第三代时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子女既能养老、爱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老人又能帮助子代，享受儿孙绕膝天伦之乐，三代人互相受益的代际关系。

参考文献:

[1] 萧振禹主编. 养老你指望谁. 北京: 改革出版社, 1998.

[2] 潘光旦. 祖先与老人地位. 潘光旦文选.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3]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化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 1983, (3).

[4] 邓伟志, 徐榕. 家庭社会学.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5] 李宏规, 张纯元主编. 治本之路.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5.

[6] 冯立天. 新生劳动力培养费用调查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1987. 5.

[7] 国家计生委课题组. 我国计划生育效益研究. 人口与计划生育, 2000, (5).

[8] 国务院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2001- 3- 28. [责任编辑 齐明珠]

(上接第 8 页)

第五，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地区之间、特别是发达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日趋激烈。如从人口迁移流向分布所反映的迁移人口用“足”对区域发展活力及经济增长趋势投票的结果来看，在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珠江三角洲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十数年的积累，终在 1990 年代后期骤然发力，势压长三角。珠三角的这一发展势头，在本世纪初还将明显表现出来。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作为中国两大精华地区 and 经济发展龙头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竞争还将持续下去，二者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也将促进和提高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刘铮. 我国沿海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0. 21.

[2] 跨世纪的中国人口 (综合卷) 编委会. 跨世纪的中国人口 (综合卷).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

[责任编辑 齐明珠]